

历史不容遗忘 正义不会缺席

——二战后对日战犯审判纪事三则

陈亦楠



图为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 黄金崑摄（人民视觉）

书里书外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近日出版的《正义的回响：二战后BC级日本战犯审判启示录》钩沉来自四大洲13个国家和地区29所档案馆的史料，系统梳理还原二战后中、美、英、澳等同盟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对日军战争暴行审判的概貌，记录了国际社会以法治精神清算战争罪责、重塑国际秩序的努力。在发掘审判档案的过程中，诸多被尘封的历史得以重现。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罄竹难书，限于篇幅，这里仅讲述其中三个片段，以奉读者。

“地狱航船”驶向罪恶深渊

二战期间，日军运输盟军战俘的船只上不悬挂任何标识旗帜，被称为“地狱航船”。战俘们被关押在无通风和卫生设施的货舱，像牲畜般被转运，常因虐待、患病死亡，最后尸体被抛入大海。

曾被“地狱航船”运送的战俘中，除了众所周知的“里斯本丸”号英军战俘，还有参加过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八百壮士”。“八百壮士”中有57人被“地狱航船”送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拉包尔修建战时隧道。在火山频繁爆发、疟疾肆虐的艰苦环境中，战

俘们经受着非人的待遇。一旦病倒不仅无法得到医治，还将面临更加悲惨的命运。驻扎拉包尔的日军第八方面军少将广田明曾下令，凡战俘生病3日以上而无法继续工作者，将一律被处死。

二战后，在拉包尔担任劳工小队队长的李维恂，在澳大利亚法庭上为两起虐杀中国战俘的案件作证。我们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和国家档案馆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到李维恂的证词：“1943年1月29日，我见到了我刚提到的10名中国士兵，他们的身体非常差。中国战俘被扔进了坑里，日本兵用枪射杀了他们。2月4日，同样的暴行再次上演。”最终，这两起惨剧的罪魁祸首——军曹相泽治索被判处无期徒刑。

1945年到1951年的6年间，澳大利亚在达尔文、拉包尔、新加坡等地相继设立法庭，一共进行了约300场对日本BC级战犯的审判。在澳大利亚审判的法庭上，受害人的国籍十分广泛，有128宗暴行与中国人、印度人、印尼人及南太平洋岛民相关。

罪行终将付出代价

1941年12月7日清晨，350多架日本战机偷袭轰炸了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1942年4月18日，16架B—25轰炸机从位于太平洋的美国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起飞，执行首次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任务，这就是杜立特行动。

任务完成后，其中13架飞机迫降在中国安全区，机组共有64人经由中国人民营救，得以安全回国。另有8名飞行员因迫降在沦陷区，全部被日军俘虏。他们随后被送往中国上海，关押在四川北路的大桥大楼牢房里，当时这里是日本在上海的宪兵司令部。

被俘飞行员尼尔森后来回忆这段可怕的经历：“日本人把我从牢房里拉出来，开始盘问我的任务信

息。我被迫躺在地上，被执行‘水刑’。4个士兵分别坐在我的四肢上，第五个人把湿毛巾蒙在我的脸上，并往我的脸上倒水。每次我想呼吸，就会吸入更多的水，导致产生濒临窒息的感觉。”

1942年4月28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召集他的主要阁僚开会，决定如何处置这8名被俘的美国陆军航空队员。10月15日，设于上海的日军第十三军司令部，对8名美国飞行员进行了所谓的“军事审判”。最终判处3名飞行员死刑，于当日下午执行枪决。其余5名飞行员被判无期徒刑。整个审判用了不到两小时的时间。

二战后，美国分别在上海、横滨、马尼拉、关岛和夸贾林岛设立5个军事法庭，针对日本BC级战犯展开了军事审判。1946年1月18日，美军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军事法庭。40天后，该法庭对虐待和杀害杜立特行动飞行员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军事审判。这次审判，法官、检察官、律师都由美军军官担任，聘请的翻译里也有美国人也有日本人。庭审进行了20多次，询问了大量证人，通过法庭辩论获得有效证言。

1946年4月15日，美军上海军事法庭判处泽田茂、冈田隆平、立田外次郎重体力劳役5年的监禁，判处和光勇精重体力劳役9年的监禁。

新中国独立对日战犯审判

1956年6月至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和太原分别开庭，对45名在押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独立开展的针对侵略者的正义审判。受审的日本战犯全部认罪悔罪，创造了国际战犯审判史上的奇迹。

中国政府在审判日本战犯时，借鉴纽伦堡和东京审判模式，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开展大量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中国政府保障日本战犯的合法权益，提供日文版起诉书，为日本战犯专门指定翻译和辩护律师，保障其辩护权。法庭确保每件起诉罪行都有充分确凿的证据，包括被害人或蒙难者家属的书面控告、当地居民证词、日伪档案和报刊书籍记载、战犯同僚与部下的举证，以及战犯本人的供词等。



《正义的回应：二战后BC级日本战犯审判启示录》：陈亦楠编著；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6月9日，沈阳法庭围绕首批8名日军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其中包括在担任日军一一〇师团一百六十三联队大佐联队长期间，指挥制造北碚惨案的上坂胜。

北碚惨案亲历者李德祥等人出庭作证，指认上坂胜在北碚村使用化学毒气杀害平民。面对指证和控诉，上坂胜下跪谢罪，供述了自己制造北碚惨案的过程：“在定县南方的罪行是第一大队所为，在淞沱河北岸地区的罪行是第二、第三大队所为，其残酷手段中最毒辣的就是使用毒气，尤其是将大批八路军战士与村民驱入地道内而使用毒气，大批的人被杀，用刺刀刺杀或者用军刀斩杀及强奸等”“我如此指挥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发挥了残酷性”“我在中国人民面前衷心谢罪”。

法庭上，8名日本战犯均服法认罪，分别被判处13年至20年有期徒刑。上坂胜，因毒杀难平民，犯下反人类罪行，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参与七三一部队罪恶活动的榊原秀夫，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

历史不容遗忘，正义不会缺席。战犯审判法庭对日本近代侵略历史作了定讞，但日本右翼势力对战争罪行的否认和诡辩，已成为对世界和平发展的威胁。面对这股历史逆流，我们有必要重温战争审判的历史逻辑，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尊重国际法以及遵守国际秩序的广泛共识。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

眉山的苏轼在哪里

阿来

苏轼是个成就很高又很有趣的人，他和各个阶层的人都自来熟，又为老百姓说了不少好话，所以喜欢他的人特别多。喜欢他，就研究他，以至于苏轼人生中的许多足迹，我们都非常熟悉。奇怪的是，在他的出生成长地——眉山的事迹，我们反而知之甚少，写他这一段人生历程的书籍也不多。我们不由得要问一句：眉山的苏轼在哪里？

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一个人的出生地及童年成长经历，对他的品格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当我们研究苏轼思想、苏轼诗文的时候，若不研究他的成长经历、家庭影响、地域背景，形成的研究成果会大打折扣。

为什么写苏轼在眉山的书籍这么少呢？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史料缺乏。我们现在熟知的苏轼在眉山的生活点滴，大都来自苏家父子诗文中的回忆，或者同时代人的一些碎片化记载，内容很少，细节也不够清晰。二是少有关注，在“三苏”成名之前，他们获得的关注并不多。三是地域偏僻，眉山离京城开封较远，和上流社会的交往少，因而被记录



的机会也少。

但是作为眉山的名片，作为世界大IP，苏轼的童年经历又必须是清晰的。尤其是眉山人，有许多问题是必须回答的。比如苏轼在眉山的具体出生地究竟在哪里？是在眉山城里还是在乡下？苏轼在读书的时候，和王弗是否真有唤鱼联姻的故事？苏轼诗文中经常出现的蜀山，是瓦屋山还是峨眉山？苏轼青年壮游时去过这里吗？身处偏远之地眉山的苏家父子，是通过怎样的方式，与朝廷的一众达官显贵取得联系的？

眉山市政协显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组织撰写了《吾家蜀江上：苏轼在

眉山》这本书。该书并不是苏学专家写的学术著作，而是本土作家写的纪实性文学。这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学术著作是需要史料发现和考古发掘来支撑的，没有这方面的成果，学术著作很难完成。纪实性文学则只需要在尊重已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文学描绘与文学想象。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可以通过文学的手段实现文学的真实，而文学的真实往往是一种更有感染力和更容易让人信服的真实。

《吾家蜀江上：苏轼在眉山》是达到了文学真实的。这部作品用文学的方式，解读了苏轼作为一个思想体及文学体，产生于蜀地眉山的必然性，产生于宋代的必然性，产生于苏家的必然性。作者对已有史料的使用是尊重的，严谨的，不生造，不虚妄，不过度。它的文学表达也是出色的，有独特的解读，有丰沛的才思，轻松每能莞尔，掩卷还有深思。这样的阅读体验是愉快的，它给喜欢苏轼、研究苏轼的朋友，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基础性文本。

苏轼是一座富矿，他在眉山的这一段，眉山市政协已经进行了一些不错的挖掘。但这显然还不够，我们还希望有更大的惊喜出现。

我们期望着。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

理解算力，才能理解数字社会

陈耿宣



算力，已成热词。但对许多人而言，它是新闻标题里的技术术语，既熟悉又难以把握。如果说蒸汽机承载了工业时代的想象，电网塑造了现代城市的形态，今天的算力，是否也具备了改变社会节奏的能力？

政策文件频繁提及算力，媒体讨论着“东数西算”“超算中心”“AI芯片”等名词，企业决策越来越依赖模型分析与数据模拟……结构性变化背后，算力在持续推动。算力生态不同于自然意义

上的生态系统，并非自发生长，也不具备自然平衡机制。它的运行依赖能源支撑、制度参与、商业投资、人才培养、数据供给等多种要素持续投入。使用“生态”这个词，是为了强调这种结构的联动性、演化性与系统关联。

本书试图摆脱行业报告式写作。我们不以某一类设备为出发点、某一项技术为主线，而是从问题导向出发，围绕算力如何融入社会运行、如何塑造产业逻辑、如何参与公共决策展开。讨论的要点不在“技术怎样实现”，而在“社会怎样转型”。我们关注一种趋势的形成过程，而非某个产品的更新周期；关注结构变化中的关系重组，而非局部技术的短期爆发。面对这种变化，我们应当

保持清醒：算力是否公平可得、是否高效可用、是否安全可靠，都会影响一个社会的运行底线。

因此，这本书不是写给程序员员的工具手册，也不是写给管理者们的操作指南，而是希望为更广泛的读者提供一个进入“计算社会”的入口。每一位读者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视角阅读这张地图，也可以用自己的经验验证其中的逻辑结构。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由算力编织的社会，理解它，不是为了技术本身，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的位置与方向。
（此文为《算力生态：中国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一书序言，本版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要有光》：梁鸿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青少年心理健康，牵动着家庭、学校与社会的神经。青少年为心理健康高风险群体，作家梁鸿用3年多时间走近那些被情绪问题困住的孩子，走近家长、教师、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写下了交织着人文温度与现实重量的非虚构新作《要有光》。

该书以京城、滨海市、丹县三地为本，兼顾了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城乡镇的不同光谱。经由作者细腻的讲述，我们会发现，青少年心理问题往往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结果。有的是原生家庭的情感疏离将孩子推入深渊，有的是教育竞争的内卷把家庭拖入焦虑漩涡。作者变换叙事视角呈现孩子的内心世界，用对话、日记、特写等多元文体为每个人留出倾诉的空间，用文学的方式让数据变得有血有肉，让情绪变得真切可感。

《要有光》在直面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同时，也引发我们对养育与教育的思考。曾经带给许多70后、80后父母梦想与荣光的求学路，何以成为下一代过不去的坎？作者用大量真实案例让读者意识到，如果把培养孩子变成一场场通关升级，把成绩视作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那么这些最终都会化为压在孩子头顶的如山重负。

如书名所示，《要有光》执着地寻找光、看见光。“光”来自专业的坚守，在乡村学校推广心理健康教育的老师，专门向患有心理疾病的孩子敞开大门的辅导班“爷叔”，用共情的聆听缓解少年精神压力的医师，他们都在努力帮孩子们重建秩序。“光”来自亲人的坚韧，母亲的身影一直陪伴在孩子左右，与他们并肩走出阴霾。“光”更来自孩子们，他们在低谷与困境中依然保有对生命的热爱，有的孩子痊愈后选择攻读心理学专业，有的孩子重返校园、继续学业，有的孩子融入社会重拾生命的尊严，他们惊人的韧性成为书里最耀眼的光亮。

逐光而行，破茧重生。作者将个体故事编织成警世之镜，让读者从镜中看到熟悉的影子，进而去反思教育方式，审视家庭文化，这种看见、召唤与共鸣，正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教育的本质不是竞争比拼，而是守护生命的成长；让孩子健康成长，也不只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的使命。愿我们都能带着书中的悲悯与勇气，成为那束光的一部分，用理解代替非议，用陪伴代替苛责，用包容代替偏见，用行动战胜冷漠，这是《要有光》带给我们的珍贵启示。

光，我们一起点亮
——读梁鸿《要有光》
李蔚超

世界记忆 理应共同铭记

严海建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10周年。一批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新书问世，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二战期间的这一重大惨案作为人类共有的历史，正在为世界所铭记。

南京大屠杀期间在中国的西方人士，留下了大量一手的即时记录。例如，国际安全区主要负责人拉贝和明妮·魏特琳的日记，是南京大屠杀最为人所知的记述。今年，《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同步出版了修订版，且增添了大量考据注释，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相关历史背景与事件细节。

1997年，《拉贝日记》首度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时，日记中一些人名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得到确认，其中化名为“罗福祥”的人格外引人关注。据拉贝所述，“罗福祥”是一名中国飞行员，曾击落多架日本战机，自南京沦陷以来一直藏在拉贝的房子里。1938年2月，他被拉贝以个人身份救出南京，后赴香港。以《拉贝日记》的修订为契机，历史学者经过多方查考，最终确认这位中国机长为当时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第二十二中队中队长黄光汉，其抗战经历，包括进出南京的过程也得以还原。

新修订的《金陵永生：魏特琳传》如实记录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传教士魏特琳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立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保护上万名中国人的感人历程。全书从20多年前的16万字扩展到现在的30余万字，72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魏特琳与友人的往来书信、新整理公布的金陵女大档案等文献，都为新书的修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书除聚焦战争暴行外，更关注战争创伤。南京大屠杀结束后不久，魏特琳精神彻底崩溃，不得不返回美国接受精神治疗。1941年5月14日，在离开南京整整一年后，魏特琳打开公寓厨房的煤气开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魏特琳不仅是战争灾难降临时的援助者、记录者，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

史料外译是近年南京大屠杀历史传播的一大重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中国外文局合作推出了史料外译丛书《二战记忆：南京大屠杀》，本年度新出版的《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判决》和《南京审判：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判决》两册，选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证人证词、庭审记录、判决书等重要文献，并做了相关注解。配合审判所开展的大规模罪证调查以及法庭最终作出的判决，明确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基本史实。世界读者可由此更深入地了解南京大屠杀的法律定论与历史结论。

铭记南京大屠杀历史，必然要求施暴者深刻反省战争暴行，反思战争责任，建立正确的历史认知。今年，《被改变的人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生活史》一书翻译成日文并出版，这是首部在日本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他们的讲述始于大屠杀前的平静生活，而在大屠杀过后多年，其恐惧、战栗、悲痛仍在，真实反映了南京大屠杀给亲历者造成的无法治愈的巨大心灵创伤。与此同时，《一个侵华日军的日记——〈森冈周治日记〉实录》在国内出版。森冈周治曾是侵华日军第三十师团第三十旅团第三十八联队的辐重兵，日记记录了1937年8月至1939年8月他亲身参与的侵华战争。森冈周治以极为冷漠的口吻，陈述在南京“有十万中国守军战死”、中国士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于玄武湖岸”等残暴事实，使人深切感受到战争对人性的扭曲。

记忆，不仅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基。南京大屠杀历史主题的图书出版，体现了历史记忆持续跨越国界、穿越时间，从亲历者转向代际传承，进而成为人类共同记忆的进程。传承记忆旨在倡导和平，这也是南京大屠杀历史作为人类共同记忆背后的价值依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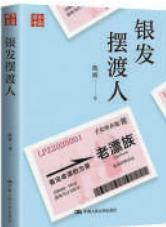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新书上架



《携手推动世界现代化：探索“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路径》：胡必亮、刘倩等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解析世界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以及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



《银发摆渡人》：陈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以家庭社会学视角分析“老漂”家庭的育儿生活，引导中青年在“做父母”“做儿女”“做自己”之间找寻平衡。

读书

本版邮箱：dushu@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张明瑟 版式设计：沈亦伶